

浙学及其周边：从地域学术到地方文化

陈永革¹

【摘要】 浙学是浙江大地上具有“现象级”意义的地域学术景观。南宋“浙学”之说形成之后，面向浙学的事实描述与价值评估开始出现。从总体史上看，事实描述的浙学，乃是指创发于浙江的思想学术传统，既包括浙江思想文化产生、发展、嬗变的历史传统及其所构成的学术共同体，也涵盖这一思想学术传统与不同时期的浙江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式、人心习俗等相互作用的（地域）文化共同体。浙学并不是一个狭隘的、一地一派的固化概念，而是普遍性与地域性并存、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的动态概念。至于浙学的价值重估，则基于学术规范意义的反思与探索，在浙学研究领域呈现出古典浙学、义理浙学、历史浙学、文献浙学、文化浙学、生活浙学等众多形态。本文立足于浙学的总体史观，认为中国学术传统的生态结构向来具有地域特色，明确提出“浙学及其周边”这一具有变奏性的论述主题，通过对浙学文化“周边”形态及其构成内容的初步辨析，尝试提出一种有关“浙学”的历时性描述与价值论评估，再现浙学如何在地域、思想、社会、文化等众多“周边”聚集中演绎出浙江特色的思想话语、精神气质，如何在求通与变通、凝聚与包容、认同与扩展的历史脉络中，拓展成为浙江独特且富有活力及共识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社会记忆。

【关键词】 学术与文化共同体 浙学研究 地域间性 “周边”关系

一、引论：“周边”所构建的他者与共同体

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解读框架，对其基础性构成，颇为流行的主要有四种模式。其一是依附于历史分期的解读，如写入教科书中的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

其二是对于内容构成的分解，区别为儒、释、道三教之学。此一区别的背后，同样有着历史的分期意识。上述两种的学术分论，可谓是最具流行意义的解读模式，具有经典性。尽管时下出现了“新诸子学、新经学、新玄学、新佛学、新宋明理学”等重新出发的再阐释现象，但其历史分期的预设仍若隐若现地存在着。

其三是在倡导国学文化的热潮之下，探索经学、史学、子学、文（集）学“四部”传统学术的学科化路径及其大众化展开。

其四就是时下最为火热的区域学模式，其立足于古今通贯，彰显地方特色，通过“本地化”的持续研究来扩展学术“属地性”、充实文化“在地感”。各地数量可观且直接以“地域”为标名的“文化工程”“文库文丛”层出不穷。

中国学术传统的生态结构向来具有地域特色。区域作为既在的事实，在历史上并非一成不变。在海外汉学界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中，颇为突出“区域”的形象。如施坚雅曾提出中国宏观社会的“八大区域”之说。¹对于中国宏观社会的区域划分，主要着眼于明清时期的社会变动与文化构成，而且有着后世行政区划的影子。

地方性的文化挖掘与整理，固然可以厘清地方化学术的脉络与历程，但其所廓拓出来的“地方性文化”，仍然趋归于更大领域的“文化家族类似”。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化的认知路向总是在地方化学术与地方性文化之间寻找更广阔的平衡。

¹作者简介：陈永革，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浙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首席专家。（杭州 310007）

具体而言，诸多历史叙事之下的学术文化，天然地形成了学术文化形态的“历史”及其周边，构成其基于时间经验的历史形态，可称之为“世代的周边”；而学术文化的地域形态，则构成了学术文化的地域“周边”；学术文化的学说内容及其思想特色，则构成思想文化的“周边”。如此等等。

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文化的地域性及其衍生的“地域间性”，既是中国传统学术生态的构成类型，更是其传统特色。作为学术文化的共时形态，地域“周边”作为空间地域的既定形态，使学术文化具有历史形成的空间形态，而“地域间性”则使这些学术文化构成地域形态的“他者”。

换句话说，“周边”的地缘性具有历史的弹性，使“周边”并非全然立足于地域的“空间性”，而是需要将“关系（脉络及网络）”总体纳入考察视野，从而赋予“周边”以“关系（网络）”的范畴特质。

周边及其所形成的综合关系，乃是构成共同体与他者的基本观念。关系是处理“他者”与“共同体”话题的一把钥匙。若无周边及其关系的预设，既取消了共同体存在的合理性，亦遮蔽了他者的存在。共同体与他者是具有交互的存在。

共同体意味着他者的存在，但他者的存在未必意味着共同体的存在。比如说，南宋之所以出现浙学发展形态的一个高峰，与其“举世重交游”的行走风气颇为相关。交游就是与诸多类型的“他者”相往来，交游意味着“周边”的扩展与延伸。

正是由于“周边”的多元形态，浙江并非仅仅只是“浙学”在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区域。若就“浙学”历宋而明的历时形态而论，无论是“浙东学派”，抑或是“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北山学派”“姚江学派”等等，通过属地的具体标识，彰显其学术的文化品格，扩展其综合影响，其背后显然都有其“地域间性”。

另外，作为总体史的“浙学”，若缺省了闽学、赣学乃至湖湘之学等“周边”或他者的参照，其学术形态必将以其他方式呈现。反之亦然。

正是基于“周边”这一兼顾他者与共同体的关系范畴，可以对于浙学进行多维度的解读，有效地拓展浙学的综合认知，或能开展出当下浙学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路径。

从浙学内在的学术维度来说，作为方法的浙学、作为（地缘）区域的浙学、作为（学术、学科）领域的浙学、作为文化的浙学、作为范式转化的浙学等等，都可以成为打通的综合议题。

因此，浙学文化之为“众缘聚合”的共时性，把同处浙江大地而影响甚大的诸多浙学文化形态纳入学术视野，当是合理合情之举，可以充分呈现浙学作为区域研究而趋向总体史所内在的拓展空间。

二、转向总体史的“浙学”重估

从现代学术的视角来看，“浙学”显然是一种集成表述，而不是一种具有分析性的严格实体。面对浙学的在场，其总体史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从未有过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单一化的浙学形态。

从时空性的描述意义上，浙学传统归属于中国学术传统的一种地域形态，如果我们不甚恰当地以“国学”置换“传统学术”，那么浙学似乎是国学的浙江形态，而浙学研究就成为研究浙江的国学呈现。

尽管如此，“浙学”仍然有其确定的历史性的实存内涵。正是这种实存内涵的客观呈现，使浙学的当代解读展示出区域研究的总体特征。亦正缘于此，有关浙学的历时形态及相关研究呈现出“众缘聚合”的共时特征。

浙学的历时形态，大致有着三种基本情形。其一是浙学形成的历时性，其二是浙学演进的历时性，其三是浙学作为阐释对象的历时性。

这三种情形都涉及诸多见仁见智的议题，并且从南宋“浙学”之说的现世后，累积着众多历史文献，在此暂且存而不论，而只是提出一种有关“浙学”的事实描述与价值评估。

所谓“浙学”的事实描述，宽泛地说，“浙学”是指创发于浙江的思想学术传统。其内涵既包括浙江思想文化产生、发展、嬗变的历史传统及其所构成并最终成就的“学术共同体”，以其思想原创性强、历史影响广泛、地域特色鲜明而融汇彰显于更广阔的中国学术传统之中，也涵括这一思想学术传统与不同时期的浙江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式、人心习俗等相互作用的“（地域）文化共同体”。

“浙学”并不是一个狭隘的、一地一派的固化概念，而是普遍性与地域性并存、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的动态概念。“浙学”在不同历史时期，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学术现象”乃至“学术群体”的实存，颇受关注。如南宋朱熹、黄震，明代刘麟长、刘宗周，清代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俞樾、宋恕，近现代的章太炎、梁启超、曹聚仁、吕思勉等。

不同历史时期的“浙学”，无不作用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并发挥着较大的文化影响，并成为区域性传统思想文化的典型呈现，体现了普遍性与地域性相结合的鲜明特色。

所谓“浙学”的价值论重估，因其涉及主体与立场的多元性，所讨论的议题远比“事实描述”更显精微。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重估浙学”不是“批判”，更不是“解构”，而是具有学术规范意义的反思与探索。在此意义上，“重估浙学”，其实就是力图与前圣时贤全面对话中的再出发。

本文之所以提出“重估浙学”，主要是有见于当前“浙学研究”的两大具有“共相化”的学术现象。第一种现象是“围着讲浙学”，即围着不同时期、不同人物、不同文本，基于各自学术规范而讲论种种“浙学”现象。

这可能导向浙学的窄化解读。第二种现象是“拉开讲浙学”，说得直白一点，“浙学”是幌子，借着“浙学”拉开讲论名相与名目同样繁多的诸多浙江文化现象。这或许将引向浙学的泛化解读。

有鉴于上述浙学研究的共时形态，尝试重估浙学成为了一种可能。透彻地说，面向浙学本身的价值重估，旨在思考浙学研究与浙学本身的正当性关联。

为此，浙学研究者面对“照着讲浙学”“接着讲浙学”显得颇为难得之时，开始作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突围之举”，试图作出一些更细分的“学术范式”，甚至提出“古典浙学”“义理浙学”“历史浙学”“文献浙学”“文化浙学”“生活浙学”等等，通过对浙学的学术分解，促进了“浙学文化”的百花齐放，“浙学形态”的缭乱繁呈。

众所周知，浙学与浙东之学具有天然的渊源关系。浙学的历史性现身，其原初形态乃是与周边的主流学术活动比照而成的一种表述符号，最初未必具有严谨的、当代学术框架下的规范性，而是在其历史演进过程，赋予了浙学自身独具的生机与活力。

这种赋予过程，其本身就是极具特色的学术创造，从而使浙学成为历久弥新的学术景观。比如，南宋时以叶适集大成的永嘉之学，不仅与朱熹“闽学”、陆九渊“赣学”（“抚学”）鼎足而三，更是宋代“浙学”的一大标识。宋代“浙学”之盛，莫过于此。

从浙东之学到浙学的历时演进，折射出不同时段学术活动的曲折变迁。在此曲折展开的变迁时段与过程中，研究者感受到

了浙学传统与浙学研究之间所具有的学术张力。这种张力的内在制约，源于任何一种学术传统无不具有的相互参照、相互交往的层圈结构，并由此构成一种具有浙学现象的共时形态，使浙学的历时形态及相关研究呈现出“众缘聚合”的总体史特质。

总体史不可直接等同于普遍史，亦并非意味着整体史。学术共同体现象的“总体史性”，不仅仅意味着研究范围的相对独立与完整，同时也需要明确作为总体史研究的范围要受到制约。否则，就会抹煞了作为总体史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与相对完整，甚至让人质疑所谓总体史研究的学术正当性。

浙学研究的总体史特质，意味着必须把地缘、时缘、人缘、文缘等诸多因素全都摆进来综合考量，堪称为“聚缘中的独立”，甚至有必要进行某种从“作为浙学的方法”到“作为方法的浙学”的思考转向。

当然，这并不是说“作为浙学的方法”与“作为方法的浙学”可以直接转换，更不能说是可以随意置换，而是试图明确浙学作为地方性知识与学术共同体的“总体史性”之所在，扩展浙学研究的学术视域。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日益成熟，总体史的研究视野及其方法倍受瞩目，因其能够持续深化区域研究的相关领域。区域成为方法，正逐渐成为区域学术研究的最高褒奖。

作为浙江大地具有“现象”级意义的学术文化景观，通过总体史的共同研究，有没有看到“作为方法的浙学”的前景？在看到“作为方法的浙学”的前景之先，更大的可能是率先理解“作为文化的浙学”。

为此，本文提出“浙学及其周边：从地域学术到地方文化”，其实就是透过“浙学及其周边”这一集成式的“他者关系”，更清晰“地方性知识与学术共同体”的思考主题，希望能够把学术文化、区域文化进行更长时段的综合研究，进而拉开来讨论“浙学”的思想原创、历史影响、地域特色。

任何共同体都有其相对具体的历史内涵，都有其具体的知识建构、学脉演进等动态展开。在此展开过程中，形成了综合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周边”网络。

离开了历时性的“周边”观照视域，就会模糊作为“学术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双重共同体）的“浙学”特质，无法在系统挖掘地方性知识建构的同时，积极思索、评估一个相对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浙学”影响及其价值意义。

所谓“浙学及其周边”，主要有四层涵义。其一是，作为“浙学”的综合“周边”，即围绕传统“浙学”这一既具有共时性更具有历时性的概念展开探讨，涉及浙学的综合内涵、特质及其辨析、阐述。此属于浙学的义理形态或古典形态。

其二是，作为历史的“浙学周边”，即对于“浙学”历时性的文本、活动、区域、影响等综合形态。此属于浙学的历史形态或文献形态。

其三是，作为区域思想文化共同体的“浙学周边”，即梳理并讨论“浙学”的地理过程及其展开形态，涉及赣学、闽学、湖湘之学、徽学、苏学、巴蜀之学、关中之学乃至东北亚思想跨文化交流等“周边关联”。此属于浙学的“关联形态”或“交往形态”。

其四是，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浙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周边”（文化的“周边”），如浙学与佛教文化（佛学）、浙学与仙道文化（仙学）、浙学与民间文化（俗学）、浙学与西方文化（西学）等。

此外，还可能涉及更细致的地域文化交流现象，比如浙南与闽南之间的人口移动与文化流动等。讲得更明白一点，所谓“浙

学及其周边”，就是要尝试思考浙江学术的认同、凝聚、接纳、传播、扩展等综合文化生态。

通过“浙学及其周边”的多路径思考，或许可以接近浙学价值的多元重估。

三、作为文化场景的浙学周边

浙学的出场与在场，既有其刚性的一面，即浙学与浙江大地的天然关系；也有其充满柔性（或弹性）的一面，即浙学充满了历史文化的动态联结。出于这种历史长时段变迁的文化弹性，使浙学并非象浙江大地上的任何一座山、任何一条河那样具有实在性。

无论是历史传统意义上的浙学，还是学术规范意义上的浙学，即使没有明确一致的严格界定，但已经先在地表明了一种“总体论”的观念心态。

对于“浙学”的总体概念（或称之为“总体浙学”），即使是出于“表述上的便利性”，显然仍有其“想像的共同体”之嫌，或者说是一种“观念化（概念化）的共同体”。为了解浙学成为“想像的共同体”之嫌，又想把浙学一网拢住，研究者自然而然地想到需要区分出浙学的不同层级。

“浙学文化”却有着场景化的整体感，决不是“想像”的产物，并构成浙学研究所关注的持久议题。无论多么抽象、甚至偏激、偏僻的浙学文本，都有其思想的真实场景。

正是在此意义上，文本现世，其本身就具有公共性的文化存在，更不用说那些朝向公共领域、影响社会行动的经典文本。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考量，无非就是还原与阐释，即通过还原文本并阐释话语。

具体而言，进入总体视野的浙学，首先面对的就是浙学作为文本的历时性存在，不仅大量的浙学文本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而且还深入文本背后的细节；不仅关注文本，还多方阐释文本所呈现的话语。

正是在此过程中，浙学文本及其话语阐释的复杂微妙呈现出来。人们发现理解个别文本就必须同时理解其他所有文本。浙学（其他区域文化同样如此）就是在“求通求同”（寻求普遍性、整体性）中降下了自己的身段。这也是导致“泛化浙学”或者说是“浙学文化”现象的学术语境。

浙学从“求通”转向“变通”、从“求同”转向“存同”，比较稳妥的处理方法就是还原浙学演进的阶段性，并概括提炼出相应的话语体系。

比如南宋浙学虽然有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等等分别，但大都可归于浙东事功之学（经史之学），这正是朱熹称为“浙学”的原初义。

历元、明、清，对于浙学最简约的处理方法，就是依据这种朝代的区分，有其明确的时间尺度，并使人们有着大致趋同的理解。

但久而久之，随着时间的日渐推移，历史的疏离感日渐强化，面对相对抽象的“浙学”文本文献而言，更有效的还原与阐释，就要求研究“范式”作出相应的转变。

尝试而论，研究者可以将“浙学研究”的相应范式，从历时性的时段（朝代）相续，转化为浙学研究的层圈结构。作为“浙

学”研究对象，至少具有四大层圈。最核心的层圈是“浙学的义理研究”，包括思想要义、学说旨趣、观念范畴、话语表述等。

其次是“浙学的文本文献”，可以归并于“浙学”的古典研究；再次是相关的中间层圈——文物文人，属于“浙学”的历史研究；最外围的是文化文教，属于浙学的社会文化研究。四个层圈相互交集，错综复杂，构成浙学的大致整体。当然，还可以有其他更细致的辨析。

从学术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视域来看，区域性的研究虽然属于“部分”的研究，但“部分”同样能够反映“整体”，并因此而成为“整体”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区域性的人文研究，既不能不加辨别地扣上“地理决定论”的帽子，同时也要避免单纯的“区域主义”。

其实，在特定的时空内，对于诸多类型的社会历史现象进行文化地理学考察，不仅可以更加立体地呈现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现象，而且可以深化对整体历史文化现象的思考。

浙学研究中天然禀赋的历时性脉络，需要结合浸透于现实生活秩序的、毛细血管般的诸多学术文化，并给予更充分的关注。无论是“古典浙学”（“义理浙学”）、“历史浙学”、“文化浙学”还是“生活哲学”或“社会浙学”，所有上述四种类型都有其现实存在并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

如此类型上的扩展，可以拓宽浙学的总体形态。举例来说，佛教与浙学之间的文化脉络，其实颇可以借此切入浙学的某些领域及许多议题。

通过呈现浙学与佛教的周边关系脉络，充分呼应浙学周边的文化场景，尽管这属于一个见仁见智的学术议题，但仍值得作更进一步的辨析。

作为浙学周边的文化场景，佛教在多大程度上“在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从宏观的视域来看，此一议题涉及浙江地域内的儒、释关系的历史情形。从中观的视域而言，浙学与佛学之间的文化交往脉络更是盘根错节。

佛教作为浙江大地上影响较持久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不能仅仅归于具有信仰特质的社会现象，而是有其独特思想文化、精神观念的因素，可以影响到地域文化的构成。

在某些历史时段，佛教影响面的确不能忽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浙学的文化周边，佛教在场却缺席，导致其专题研究一直处于相对遮蔽的状态。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一则由于其历史情形错综复杂，需要大量的文献梳理；二则是由于传统的成见，导致研究相对薄弱，积累不足；三则是要求研究者具备较强的文献解读与研判能力，同时还要具备相当的思考视野。

通过总体史与整体论双重观照下的“浙学”研究，顺势将具有持久影响的佛教文化置列于浙学周边，其本身符合“浙学文化”的历史情境，而不是“泛浙学”“傍浙学”的场景重现。

四、聚缘中的独立：浙学文化共同体及其张力

如果援引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其《中国社会史》一书中所提出的中国历史上的“二次文艺复兴”之论^②，可以看到内容最丰富的浙学形态大致出现于南宋与中晚明时期，堪称为浙学发展史上的二个高峰段。当然，作为长时段演进的区域学术文化现象，从会稽到江东、从江东到吴越，都可以视为浙学文化的早期形态。

浙学的早期形态，虽未充分彰显学派之浙学的体系化品格，但已经具备了学问之浙学的多元化雏形。从浙学类型的历史演进上看，南宋显然是传统浙学的真正独立期，既开始展现浙江学术文化的独立品格、自主意识、体系观念，更可看到浙江学术文化积累的渐进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诸多细致努力。特别突出的是，南宋浙学思想文化之创发与文献整理及传承的知识关联。

南宋时期的永康之学与永嘉之学，是朱熹等人心目中“浙学”（“浙东之学”）的两面旗帜。南宋陈亮（1143—1194）所创立的永康事功之学的思想特质，即倡功言利的国家治道论、以事功融王霸摄理欲和陈亮事功之学的思想史地位。

陈亮注重实事实功实利的事功之学，与宋儒明体达用的性理之学，有着相当程度的张力，但远不是本质的对立。指出陈亮反道学或反理学的立论并不彻底。其实陈亮同样肯定宋儒性理之学对当时社会文化的建构作用。

其事功之学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宋儒注重道德心性的价值关怀，充分意识到儒家经世理想具体化为治世事功，而不是固守于儒家偏执的义利观。因此，陈亮所开创的永康事功之学与其说是一种“事功伦理学”，倒不如说是一种“事功价值学”。

至于南宋以叶适集大成的永嘉之学，不仅与朱熹“闽学”、陆九渊“赣学”（“抚学”）鼎足而三，更是宋代“浙学”的一大标识，作出了重要的思想贡献。宋代“浙学”之盛，莫过于此。

然而，这个思想特质异常鲜明的区域性学术群体，却长期被归于“异端之学”。^③若果真如此，因其作为宋代“浙学之盛”的标识，那么就可能误导人们视宋代“浙学”为异端之论、异学之见。有见于此，实有必要重新审察永嘉学派之为“新奇”的思想特性之所在。

叶适对朱熹的“新道统论”直抒己见，将具有普适性的周礼历史经验放大到了宇宙秩序的终极高度，这就或多或少地缩小了道德人心的自在秩序。通过与陆九渊“心学”划明界限，明确提出“内外相明”“义利相和”的思想主张，从而对“治体论”提出了不同时期人的独立见识，真正确立宋代永嘉学派的思想地位，使“浙学”成为一时显学。

至于明代中后期的浙学形态，虽然同样存在“正统与异端”之辨，但相对转化更显温和的新与旧之争。任何思想学说之“新”与“旧”，总是相对而言。如正德年间的王阳明（1472—1529）“良知之新论”，在刘宗周（1578—1645）看来已成“越中之旧说”。黄宗羲断称蕺山之学“是开物成务之学。”^④

蕺山论学，其义理阐释最终落归于《大学》“诚意修身之学”之建立。诚意之学，不仅涵盖了原先“知止说”的格局，而且在《大学》诠释史上别开“诚意为主”一系，从而更深入地诠释了《大学》义理思想，自立于阳明学和朱子学之外，全面确立了蕺山学作为心性合宗体系的理论建构。

刘宗周基于《大学》的义理系统，对阳明的良知说展开了不遗余力的辩驳。其辩难核心是阳明良知“知善知恶”之知。蕺山学的基本特质，既不在于理论的雄辩，也不在规模的宏大，而在于经典文献阐释的精到。蕺山学之所以能够在宋明儒学的庞大阵营中占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宗周的文献阐释能力。

刘宗周通过崇经重史以指点心性的思考进路，将崇经重史纳归于指点本真心性，固然表明宗周不脱于心性之学的思维模式，但崇经重史的为学取向，必然把心性义理之学落实到人伦日用常行的生活事件中，从而把儒家经旨的价值意义融汇至人物事件所具体展现的人心秩序中，把圣学道统通过经史一体的统观方式加以呈现。

这无疑对清代的浙东学术的实学化（经史统观）有着导向性的启迪意义，近世的“浙学”“经史转向”，将圣学道统通过经史一体统观的方式加以呈现，开启了“经史相融、亦经亦史”的经史并重、经世务实之学风。

思想学术总是相伴于社会、政治的发展变迁。区域思想学术的“社会与政治周边”，无疑是更复杂而细微的“关系网络”。如何站立于时代思想的制高点而裨益于世人，应该成为任何地域学术追求学问之道的价值关怀。

在此方面，明末清初的浙江学术群体及其相关活动尤为典型。透过士绅与佛教僧人的知识交往活动，当人们谈论晚明时期“心学逃禅”“阳儒阴释”之类的儒佛交涉现象时，最值得考察的对象当推江浙地区的演进情形。

作为阳明良知心学的主要策源地，中晚明时期的浙江士子的儒佛之辨，呈现出了不同的思想类型。在阳明亲传弟子（如王龙溪）中，主要以倡发良知体认为宗归，而在浙中王门的二传及三传弟子中，则呈现出良知体认混同于禅门悟境的趋向。如周海门（汝登）、陶石簠（望龄）之于湛然圆澄（所谓“湛然禅”），陶石梁（奭龄）及四明准遗民们之于密云圆悟（所谓“密云禅”）。

这种毫无忌讳的引禅入儒乃至弃儒逃禅的思潮取向，严重地影响到儒家主导下的社会教化模式，不仅引发了学术歧异的日益明显，更遭到了刘宗周等人的强烈抵制，他们开始转向严分佛教禅学与阳明心学疆限，力辟“跻阳明为禅”或“阳明禅”。

为此，刘宗周等人力主以“证人”而不是“修佛”为宗归，极为明确地以当时佛门中人（如云栖株宏、袁了凡）经过佛教教化改造的“功过格”为论敌，进行纳归于儒家教化范式的重大修正，以“人谱”的形式加以推广。这种情形说明当时儒佛交涉的普遍处境，实际上是儒、释两教在现实的民众生活中如何争夺教化主导权。

众所周知，晚明时期的主流思潮表现于两大阵营。其一是王阳明所开创的“姚江心学”，其二是以矫正阳明心学为学术导向的“东林之学”。所以，后世学者评析蕺山之学，往往以姚江之学和东林之学为背景。而其背景中的背景，则是当时的共同“热点”，即援禅入儒、阳儒阴释的“狂禅之习”。

对于“狂禅”（或“狂解”）现象，自宋代以降，即为思想文化界所关注。自阳明学盛行一时后，在晚明及清代初期，“狂禅”更屡为人所提及。从语词出现的时间上看，“阳明禅”显然后于“狂禅”。

不过，对于明代学术评论家们使用“阳明禅”之词的确切时间难考其详。尽管中晚明以来，“狂禅”一词的使用已颇显普遍。特别是对于晚明那些反对阳明良知论者来说，尤显惯常。

从中国禅学思潮史上看，“狂禅”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唐宋以来的“五家分灯”禅法，二是指晚明思想界的佛儒混融思潮（或称“阳儒阴释”）。其中，尤以晚明“狂禅”为著。至于晚明的“狂禅”之风，约有四种内涵，既指狂禅之论（“教”）、狂禅之解（“理”），更涉狂禅之行（“行”）、狂禅之弊（“证”）。就社会思潮之影响而言，晚明“狂禅”之习突破了程朱理学所要求的思想和社会规范，在当时及对以后的思潮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就其思想特征而言，晚明之“狂禅”主要表现为“以禅证儒”和“以儒入禅”。

围绕浙江的阳明学者对禅学、禅法的认知及其评判，对于晚明“狂禅”风习至少可以提供一种学术思潮史的观察。如何把儒释之辨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结合起来，同样需要具体的思想史辨析，才能够把握其中的思考差异。

在阳明学者中，儒释之辨既有心性论的阐释，更有工夫论、体用论等领域的辨析。因此，涉及经世与入世、体与用、悟与修、虚与实等议题的讨论，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种二元化的辨析取向。

需要提出的是，结合宋儒以来的儒释之辨的回顾与评判，特别是阳明学者处理儒佛异同的思想论调，显然都有着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影子。无观念即无思想，观念是思想的集中体现及其相应表达。对于阳明学者儒佛调和论的思想辨析，则又回到了思想史的梳理与评估。

总之，聚焦地域学术文化的周边关系网络，意味着学术方法的转向与学术视野的拓展。地域学术文化不仅仅是汗牛充栋的文本文献，还涉及在相同地域民俗共同习有的文化记忆、教化心理。

对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教化劝善传统，同样需要反思性的知识还原，需要关注社会主流的纯粹价值教化与非主流的混融价值教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从中再现儒、释、道三教间广泛知识性交际的文化背景。而这并不是纯粹依赖于儒家话语诠释所能完全满足的。

更进一步地说，从文化交流互鉴的意义上说，浙江是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而浙学文化则是展现特色内容的一大景致。要更加完整而全面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就有必要系统探讨浙学文化“走出去”的主动性格及其“海洋意识”。

因此，浙学文化的“海洋意识”（“海洋观”）问题，即可成为一个切入的重要视角。浙学文化具有平原、山地、海域等“全域化”的典型性。“全域化”是指浙东地区的学术文化生态涉及江河小流域、海域、平原、山区等多地理形态。

“全域性”构成“浙学文化”显著特色，其中就涵括“海洋意识”。学术文化地域形态的多元存在，虽然并不成为影响文化生态的决定性因素，但对于该地区学术生态的构成必定产生一定的作用。

在当代人文学界中，“东亚性”多被用于表示现代化过程中东亚地区文化上的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视之为东亚“现代性”的观念呈现。其中，尤以占主流的儒家思想文化为典型，并因此而归结为儒学的“东亚性”。如杜维明先生强调儒家在东亚现代性中的角色^⑤，认为儒家在东亚现代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儒学可以作为现代东亚复兴的力量源泉。

其实，通过追溯北宋时期“入宋求决”日僧与佛教思想家四明知礼之间的佛学活动可以发现，浙江学术文化史上作为历史的“东亚性”，佛教文化的贡献不仅先行于儒家传统，而且其持续性亦因此甚于儒家思想。宋代浙江佛教“东亚性”，其背后就有着独特“海洋意识”。随着宋学对日本镰仓时代武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大批“浙僧”等赴日的弘法努力，为浙江学术文化的“海洋意识”注入了更多的新内容。

五、结语

浙学的“周边”充满着“聚集中的独立”，展现出中国历史上二次“文化复兴”时期的浙学的文化趣味及其多元追求。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正视浙学演进与变迁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异论”与“异见”，努力再现不同时段中浙学思想学术所处的话语情境。

本文尝试聚焦于浙学的思想原创、地域特色、结构形态、历史影响，再现浙学如何在地域、思想、社会、文化等众多“周边”聚集中演绎出浙江特色的思想话语、精神气质，在求通与变通、凝聚与包容、认同与扩展的历史脉络中，使浙学拓展为浙江独特而富有活力及共识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社会记忆。浙学研究的学术担当需要根植于本地化、扩展属地性、充实在地感，藉此探究浙江民众包容的文化心理、行为观念和共同价值。

注释：

1 八大区域具体包括：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上游地区（四川地区）、岭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云贵地区。此外，还补充了一个“满州地区”（即东北地区）。参见施坚雅（1925-2008）《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另可参见易劳逸《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第6章“八大区域”节，苑杰译，重庆出版社2019年版。

2 第一次“文艺复兴”出现于 11 世纪到 13 世纪的宋代时期,在 1550 年至 1644 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参见谢和耐《中国社会史》第六部分“中国的文艺复兴”,耿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3 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 4 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44 页。

4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5 页。

5 参见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